

关学思想在关中教育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研究

贾智鹏 李耀升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关学思想在关中教育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培养了一批崇尚气节的关中志士，不断优化着陕西社科工作者的精神品格和治学作风，塑造和培育了当代关中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性格、提升陕西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对其进行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使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继而为构建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贡献力量。

关键词：关学；关中；当代价值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10.125

“关学”与“关中”紧密相连，就字面意思而言，关学应该指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的学术，而且特指由张载所开创的关中新儒学。关学发端于宋，先后经历了元代的恢复期、明代的拓展期以及清代的反思、总结和转型期，直至今日仍在关中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培养了一批崇尚气节的关中志士

在关学思想的滋养下，关中地区涌现出了一批崇尚气节的仁人志士，如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他们大都具有不阿权贵、不苟于世的特点，吕大钧在居家讲学时，朝廷多次征召，他都未曾赴任，时值王安石变法在全国推行的如火如荼，为了反对保甲法（以朝廷直接控制乡村为目的），吕大钧兄弟撰写《吕氏乡约》，并在家乡建立乡约组织，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张载的社会教化思想。吕柟因与当时的权臣刘瑾政见不合，先后上疏武宗、世宗，直至被皇帝下狱、贬官，仍不改初心，冯从吾任御史时，冒死指责神宗“朝政废弛”，两度被罢官，多次受宦官诬陷，他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将主要心思和精力投入到讲学著述中，他创建的关中书院为陕西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刘古愚在陕西也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参与维新运动的57名陕西举子里大多数都是他的弟子，随着变法的失败，刘古愚也受到牵连，他曾坦言：“康党吾承认，愿应罪魁。”清廷在全国搜捕康党时，有人劝他暂时逃避，他厉声道：“国事如此，吾死国难，何幸如之！何言逃也！”关学学者这种坚贞气节和高尚人格，受到了当时士人和后代史家的高度赞颂。

二、优化陕西社科工作者的精神品格和治学作风

（1）坚定理想信念

作为现代意义的关中教育工作者，捋清和理顺传统关学的近现代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近代关学的最后一座高峰是咸阳刘光蕘（古愚），刘古愚一生提倡妇女教育和普及全民教育，并能张眼看世界，在实际教学中积极引进西方算学等先进实用的学科知识，为陕西乃至西北的近现代化进程培育了一大批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才。而成立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的《共进》半月刊和共进社成员，又成为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共进社创始成员中，杨钟健的父亲杨松轩、赵国宾的父亲赵和庭，都是刘古愚的学生；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等人也都是先在私塾接受的传统学术教育，后来又考入留日返陕学生（多与刘古愚或三原宏道学堂有学术上的传承关系）举办的三秦公学。再后来，分别考入北京的北大、北高师等学校。风云际会，世界侧目，他们又和师友（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探寻救国济民的良方与道路。舍小家、顾大家，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而不悔！所以，在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今天，坚定地沿着他们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继续努力，关学思想的光芒就会得到发扬和传承，进而润养一代代的年轻人，一代代爱国务实的年轻人。

（2）广泛涉猎、具有多学科背景和前沿的视角

张载很小的时候，父亲张迪就经常教育他要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并做到文武兼修，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张载饱读诗书，他尤其喜欢谈论兵事，常常与朋友一起研讨兵法，“以功名自许”。张载曾上书范仲淹，表达自己在军事上的独到见解，范仲淹很赏识张载的才干，认为他志趣不凡，可成大器，并教导他报效国家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而应该潜心研读儒家经典，这样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张载因此转而研究儒学，《中庸》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于是他又广泛研读佛、道两家的著作。渐渐地，张载发现佛、道两家的学问并不符合自己的治世抱负，又回过头来重新研究儒家经典，经过几十

年如一日的苦心思索，张载最终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佛、道的儒家思想体系。张载弟子吕大临在张载歿后奉命投入二程门下，成为程门四先生之一，但仍坚守关学的基本宗旨，二程一再申明：“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明代高陵吕柟在理学主流，心学风行之时，坚持理、气并重，力行实践；三原学者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经典，强调用心求学，求其“放心”，用心考证，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独立主见的治国理政观念。

（3）坚持求真务实

张载被东亚实学学者誉为实学鼻祖。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谈、坐论，教育学生要做对天下、对时代、对人民有用的人。张载在《横渠易说》中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验井田、观自然、为善政，都是他理论结合实践的履行之道。张载还曾协助环庆路帅蔡挺设立《兵将法》，推广边防地区军民联合训练作战，使兵识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大宋西军的战斗力。张载善于吸收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儒学理论，他注意对物理、气象、生物等自然现象做客观的观察和合理的解释，具有科学精神。明代泾阳王徵由儒入耶（天主教），传播西方科学，曾研制过水力、风力和载重机械，著有《新制诸器图说》一书，只可惜未能得到广泛应用推广；至清末咸阳刘古愚认为“士之学，从民事入，其成材必皆有用之实学。”刘古愚主持泾阳味经书院、崇实书院长达十数年，置经纬仪，设“求友斋”、“时务斋”，专以培养实用人才为任。在课程设置上先后引入算学、制造、英文等科目，还专门创设了为学生实验制造的场所。清末民初，陕西数学、测绘和经济人才辈出，就是刘古愚实学教育思想的明证。刘古愚还曾编写过《壕塹私议》，主张棉煤富国，屯垦河套。不知道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刘永福抗法时就曾用过类似《壕塹私议》里提到的战法。刘古愚的弟子中李仪祉是近代水利大家，再传弟子杨钟健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虽然，各有专长，但不妨碍他们每个人都有着深厚的关学底蕴。

关学学者坚持传统，但并不拘泥传统，能够因时而化，不断地融合汇通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正如前文所讲，西方科学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之时，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敏锐的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共通和不同，把他们的学说称为“西方儒学”，传教士被称为“西儒”。近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看作是西方

儒学之一，而成立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的共进社社员们大都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例证——特定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完美的契合了。

三、塑造和培育着当代关中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性格 提升陕西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

（1）爱国亲民 务实进取 陕西人自古就有务实进取的精神，尤其是自张载创立关学后，这种精神尤为明显。张载曾说过：“益物必诚，如天之生物，日进日息。自益必诚，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学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难矣哉！”张载生于内忧外患的北宋中叶，北有虎视眈眈的辽国，西有反复叛乱的西夏，兵匪混处，民不聊生。张载年轻时喜谈兵，甚至有联合民团首领焦寅西向收复洮河的打算，只是后来受到范仲淹的劝导才转回学术研究。但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一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毕生的追求，讲学、为政、治学，也无不以此为宗旨。

刘古愚终身致力于教育推广和普及，不曾出仕。他热情肯定泾阳、三原农民的蚕桑事业，不仅鼓励家人学习养蚕，带头聘请织绸工匠带徒学艺，且欲集资创建织布机器局，兴办实业以养书院。在集资失败后，又说“亲民在于富教，在于治愚”。刘古愚用“社仓”生息、揭债买地等办法先后在咸阳、扶风、礼泉等地兴办义学，普及乡村教育，提倡全民教育是他对国家最深沉的爱。现当代更是涌现出一大批务实进取的典型，如人称“西半城”的著名中医学家景莘农，青年时期开始悬壶济世，始终致力于中医的进步和发展，时值30年代陕西霍乱流行，他坚持采用中草药救死扶伤，使许多患者转危为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和同事及时组织医疗队奔赴高陵，为负伤归国的志愿军战士义务治病，并将在药店坐堂应诊的收入全部捐给前线。1958年关中地区流感肆虐，他和同事大胆创新，在流感群众中推广“三白汤”、“贯众板蓝汤”等中草药配方，对防治流感起到了积极作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汗水洒进黄土中。不问生前身后事，只求初心天地间”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立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响应省上在渭北高原开辟“第二粮仓”的决定，只身奔赴当时人均年纯收入35元、口粮分不到300斤的合阳县，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开始了艰难的探索研究，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他先后提出“以磷促根、以根调水”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又探索出“留茬免耕秸秆全程覆盖技

术”……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增加了当地的粮食产量，而且节约了灌溉水，解决了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当地农民饿肚子的历史也一去不复返。李立科先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爱国为民、无怨无悔、甘于吃苦、追求卓越的西农精神。

(2) 宽厚包容 与时俱进 关学思想的兼容包并对应在陕西人性格中，体现为典型的宽厚包容。张载受教于儒家经典，思接孔孟，又为了儒家学说的再造而深入钻研释、道两家的经典，尔后再融汇贯通，重新梳理出了新儒家中的一朵奇葩——气一元论和朴素唯物主义。张载是程颢、程颐的表叔，比二程也年长一些。在他已经名满京华，坐着虎皮椅给天下士子讲解《周易》的时候，张载与来拜访的表侄们有过一次简单的学术交流。随后，他就向人们推荐：可以听二程讲讲《周易》。程颢、程颐由此名声大振。不惟二程，就是和他的学生们，也是教学相长。张载的学术思想虽然囿于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未能成为所谓主流，但他温和谦逊而执一始终的学者风范，光耀千古。

明代末年的关中学者王徵，以向国人翻译并介绍西方工程技术为己任，而且他首次与西方传教士一起探索汉字拼音化，研究中西文字特点。王徵在早年赴京赶考期间结识了一批西方传教士，由于对传教士们介绍的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极为感兴趣，他与传教士们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自己也成了陕西的第一位天主教信徒，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刘古愚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后入关中书院，从黄彭年学，与李寅、柏景伟交游。主讲味经书院后，刊书购报，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和学科设置。道学课“须兼涉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史学课“须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经济课“须兼涉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训诂课“须兼涉外洋语言文字之学”；历算课“须融贯中西”；地輿课“必遍五洲”；制造课“以火轮舟车为重要”。刘古愚就是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睿者。刘古愚学生王授金（也是他的女婿）就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又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早期中共党员和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的《共进》杂志创办者李子洲、刘天章等人在诸多思潮涌入中国之际，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列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爱国亲民求真理，哪个主义能救中国，陕西先进知识分子就选择哪个主义。

(3) 尚德重礼 陕西人普遍尚德重礼，这与关学思

想中的礼法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张载将推行礼教和道德教化作为讲学的重要内容，使人们通过礼的学习变化气质，以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到吕氏兄弟作《吕氏乡约》教化乡党邻里，使乡民遵循儒家仁义，从而形成一个自觉知礼习义的社会团体……总之，这些学者们除了要求家人、弟子践履古礼，“其家童子，必使洒扫应对，给侍长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亲祭祀，纳酒浆，皆所以养孙弟，就成德”，他们自己的言行也严格遵循礼仪法度，“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他们这种身先士卒的风范对以后的关中学子产生了极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刘古愚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提倡全民义务教育。他也推崇“三代”之礼，还参考周礼制度，规划了“官师政教合一”的乡（村）、县、府、省到京师的五级办学体制。他甚至批评当时只推崇西方伦理二忽视中国传统伦理的偏向，说：“是弃祖父膏腴之业而不耕，而甘行乞于市，以求延残喘也。”但是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家和进步思想家，刘古愚也是“吃人礼教”的反对者。他重视女子教育，主张全民教育。他在《改设学堂私议》中指出：西人之设学也，以为人人应尽之义务；中国之设学也，以为士子入仕之捷径。西人无人不学，吾国则妇人去其半。此一半中，吏兵农工商皆不学，仅余士人。是中国人民中去其十二分之十一，仅余一分从事于学也。尤其在刘古愚晚年，专志于乡学（乡村教育）、小学（基础教育），秦中学风，民风皆有改观。

综上，在关学思想的滋养下，陕西社科工作者的精神品格和治学作风得以不断的优化，同时，关学精神所蕴含的爱国亲民、务实进取；宽厚包容、与时俱进；尚德重礼等特点，塑造着当代陕西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性格，在提升陕西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2]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 [3]张载：《张子正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4]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5]方光华，曹振明：《张载思想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课题名称：关学思想及其影响下的关中教育研究

课题编号：KY2020-37